

文學

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之澳門形象 ——在笛福作品中之“東方之珠”

Rogério Miguel Puga *

從十六世紀葡國人到達澳門港灣開始，歐洲作家便把澳門描述為一個文化交匯的台階。在到達印度後，葡國航海家從馬可勃羅的著作中得知中國的情況，並聽說中國人是白膚色及蓄長髮¹，但沒有鬍子。雙方接觸後，在葡國人眼中，他們的目光是奇異及陌生的。自此以後，在漫長歲月中，中、葡相互之間的關係及形象一直有所改變。引用坎達澳所提及的由於歐洲缺少描述巴西人的資料。拿巴西人與中國人相比，在性格方面：“……一些巴西人具有中國人的特徵”²。以葡國人觀點來看，美洲土著與亞洲人相比，是兩個相異、奇特及陌生的文化。因此將兩者放在一起，以便讓讀者感知世界上每個角落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事物。至於對比及類推的方法，如掌握外來事物的技巧，我們可引述富於爭論性的愛德華著作《東方學》中有關東方學的理論。在這本著作中，作者把“西方的創造物”³比喻為東方的形象。澳門就是組成該形象的其中一部分，也是葡國及英國文學的題材。

在《牛津英語大詞典》⁴中“澳門”一詞的定義是“葡萄牙在中國沿岸的殖民地，以博彩著名”，而一種名為澳門的紙牌玩意在英國⁵廣受歡迎。由於澳門的定居方式、政府措施以及在廣州嚴禁博彩，因此，澳門的博彩業可追溯至葡國人逗留澳門的初期。在十七世紀澳門博彩業的名聲傳遍歐洲各國，我們可引用上述的英國

* F. C. S. H. — 里斯本新大學。

1. 參閱塞朗著《葡國歷史字典》第四冊，第一百零八頁之埃斯托爾尼紐撰寫《澳門》一文，菲蓋里尼亞斯書局，波爾圖，一九九二年。
2. 《聖克魯斯省歷史》，由甘達澳所著。該篇文章見於里斯本阿爾出版社出版，及由阿爾布開克所著的《巴西之確認》。
3. 賓尼卡著《東方學》，布埃諾翻譯，一九九零年，聖保羅文學出版公司。
4. 《牛津英語大詞典》第九冊，第一百四十九頁，一九八九年。
5. 我們可參閱英國文學，一七七八年，馬梅布爾的著作《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中譯“日記及書信”）的第一百七十九頁提及有關博彩的資料中，註解“澳門（一種在此間流行的遊戲）”。在一七八三年，瓦爾波萊亦提及英國婦女喜歡這種博彩的社交活動，該活動亦被俱樂部雜誌所報導，包括《時代日報》，（一八八三年七月十一日）。參閱《牛津英語大詞典》，第九冊，第一百四十九頁。

資料以資證實。與此同時，當法國人特拉尼遊覽東方的時候，亦提及這種澳門的玩意。在其第三次旅程的記事中，他指出：“souhaite qu'onle Laissât aller a Macao…… après avoir beaucoup gagné au négoce quelle recevoit assez vien lees etrangers, qu'elle aimoit fort le jeu, ce Qui estoit la plus forte passion de du Belloy”⁶。

英國作家拉斯泰爾（1475–1536）⁷、莫爾（1477–1535）⁸、培根（1561–1626）⁹、莎士比亞（1564–1616）¹⁰及笛福（1660–1731）¹¹等等都提到葡國航海家是“經驗和知識的寶庫”及葡國航海家在東方遊覽的事情。其中一些作家在描述中國沿岸的旅程中，談及與澳門有聯繫的葡萄牙。許多作家都被葡萄牙發現新大陸——作為評論賈梅士民族的功績——所吸引。其他理論家則認為成功橫越好望角的事蹟，就是其中一個人類的豐碩成果：“……發現美洲及經好望角通往東

-
6. 塔瓦埃尼著《Les six voyages de Jean Baptiste Tavaernier》，ecuyer baron d'Aubone, qu'il a jait en Turquie, en Persee et Aux Indes……, imprimée a Paris, 一七一二年，第一百四十三頁至一百四十四頁（資料與題材有關）。《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博彩》，由阿馬羅所著。該篇文章見於第二十三期（第二組）《文化雜誌》第五十頁，澳門，一九九五年。
 7. 在拉斯泰爾的間奏曲 Four Elements 中，（一五二零年），曾間接提及葡國人在海外建立的功績及直接提及葡國。參閱索薩在里斯本新大學 F.C.S.H./科技基金，里斯本，一九九八年，《英葡研究雜誌》第二十一頁至三十六頁內《莎士比亞與葡國大發現》一文。
 8. 在莫爾著《烏托邦》（一五一六年）中阿德斯撰寫簡介及附註，W.W.W. Norton & Company（諾頓公司），紐約，一九七五年。小說的作者為伊洛德，書中虛擬葡國航海家到世界各地遊歷。透過上述航海家的故事反映了一個新社會，同時他亦是對抗英國伊沙貝的模範。伊洛德與韋斯普奇曾結伴遊歷。在他們最後一次旅程中：“他並沒有跟隨司令回家……他獲得阿美尼高的允許和另外廿三人一起留在航程最遠一站的一個堡壘（巴西的佛里奧角）……在韋斯柏奇離開後，他遊歷多國……最後他從錫蘭抵達加爾各答，在那裡巧遇一些葡萄牙船隻，並出乎意料之外回到自己的國家”。（莫爾，第七頁，資料與題材有關）。英國作家在真實情況的影響下，想象葡國船隊在東方遊歷的情況。
 9. 《New Atlantis》（中譯《新大西島》）由培根撰寫於一六二九年。該篇文章見於約翰遜著《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New Atlantis》（中譯《知識的進步和新大西島》），Clarendon Press（格寧頓出版社），倫敦，一九八零年。培根在其著作的開端中，提及他前往中國及日本的旅程，該地亦是葡國航海家最嚮往的地方，尤其是指澳門。在第二百二十五頁註解：“……這具開創性的六年……給予人類探索海洋的信心……”，當中亦提及葡國大發現，狄亞士（一四八八年），華士古達加瑪（一四九八年）及麥哲倫（一五一九年至二二年）。葡國大發現產生的希望導致培根描述真正及虛構的英國航海家到中國沿岸的旅程，包括澳門沿岸。
 10. 除了在《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譯《威尼斯商人》）的作品中提及葡國的海上功績及其殖民地外，莎士比亞還以葡國人的遊記來描述戲劇《The Tempest》（中譯《暴風雨》）。而《暴風雨》則是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資料。無論在東方《威尼斯商人》，第三冊，第二組，第二百六十七頁至二百六十九頁，抑或在《葡國的海灣》（《如你所願》，第十五冊，第一組，第一百九十七至八頁）所描述的旅程都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所提及。
 11. 笛福著《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一七一九年），倫敦，一九七二年。該作品後來稱為《The Farther Adventures》（中譯《魯賓遜漂流記》）。笛福在發表該書第二冊之前，在同年曾發表有關《魯賓遜》的小說，並即時獲得成功，而《魯賓遜漂流記》就是我們現正分析的作品。此外，該作者亦曾發表《The Live, Adventures and Pi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一七二零年），倫敦，一九六九年。該作品後來稱為《Captain Singleton》（中譯《辛格爾頓船長》）。

印度的航道，是當今人類世界最偉大最重要的事件”¹²。此後，該成果有助於葡國人在澳門及遠東其他地方紮根，如著作《南灣》就可證實此事。

我們的工作就是分析一些英國作家提供的有關在中國沿岸出現的葡國人及澳門的資料。在笛福的下列作品中齊集了這些資料：《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譯《魯賓遜飄流記》）及《Captain Singleton》（中譯《辛格爾頓船長》），兩位主角人物都是為了尋找財富，因而在葡國人稱霸的海岸上經歷他們的冒險故事，而這兩本小說均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另一位愛好漢學的法國人塞加倫則把各種中國生活的情況比喻為“多方面的美學”¹³。這些東方的記述向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文化。

至於外國事物的概念，我們可以以另一種文化及其獨特性¹⁴表現來說明。正如“歧異”一詞的詞綴，它意指以西方本身文化的眼光及感覺為主審視外來的活動。透過alter mundus的觀點，使我意識到澳門的情況是另一個文化互相影響的“理解”過程。外國事物比喻為多個文化範疇交匯的表現，它作為一致性的問題納入社會文化中。還有，它亦是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問題，也是一種橫向及回轉反映的玩意。因此，它表現為一種自身態度與另一方態度的密切聯繫的現象，這就如在外來觀察家的觀點中，展現了現實情況的固定模式及題材，而該模式亦逐漸變化因而得以證明上述論點。笛福著作中曾描述故事主角人物在澳門的遊歷，這是由於多個原因所導致。因為可讓讀者幻想一下遙遠的異國風情，這正如在葡國遊記的文學作品¹⁵中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作家¹⁶；又或者是由於在葡譯英的遊記中，澳門是東方一個重要的商業中轉站，這樣便使野心勃勃的英國人¹⁷垂涎欲滴。

由於在虛構的遊記中也有描述葡國航海家，因此，在這些作品中不容置疑，澳門成為歐洲進入中國的門戶，並經常與葡國航海家有所聯繫。透過遊記文學及與認識葡國航海家和其功績¹⁸的朋友交談發現，葡國大發現確實豐富了多部英國文學作品的想像力。

東印度是傑出的英雄前往的地方，正如魯賓遜及鐵鈎船長。在海上航行以及在中國內陸與中國人及日本人協商事情方面，魯賓遜需要一個作為嚮導的航海家。英國人與葡國航海家的聯盟，在他們一起走過的土地上，創造了豐功偉績而廣受讚頌。英國作家塑造了葡國人的形象，而與葡國人接觸的民族居住地亦曾是歐洲人

12. 坎南撰寫的註解及簡介見於史密斯著《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譯《國富論》）（一七七六年），Paperbacks University，倫敦，一九六一年，第二組，第一百四十一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13. 塞加倫著《Essai sur l'Exotisme》，波謝書局，巴黎，一九九九年。（遺作第一版於一九五五年出版）。

14. 參閱在韋爾博書局出版，基亞著《文學詞彙字典》內普加撰寫《外國事物》一文。

15. 為研究文學及神話關係，參閱索薩著《神話及文學創作》，興趣書籍，里斯本，一九八五年。

16. 參閱費雷拉斯著《魯賓遜與葡國的淵源》，世紀末，里斯本，一九九六年。（該作品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問題，然而，却沒有透過一些嚴謹及關鍵的例證以作合理解釋）。

17. 參閱埃斯托爾尼紐作品第一百一十一頁。

18. 例如在葡國與英國的學術經驗的交流中，我們提及史蒂芬在一五七九年寄回其家鄉的信件中，描述了城市果亞。而在其他時空中亦曾發生同樣的情況。上述的信件經翻譯後，收集在葡國皮雷斯統籌編輯的文選集中，並由英國人批閱。里斯本新大學 / INIC的現代語言及文學比較研究中心，里斯本，一九八一年，第九十一至九十四頁。

渴望成為其殖民地的大商埠，葡國人在那里曾參與爭奪該地。在十六世紀，渴望認識新大陸的英國人翻譯無數有關葡國大發現¹⁹的作品，並拘禁了葡國航海家奧利韋拉，並在一五四五年，將他帶返英國，其後，亨利八世對該事大表驚訝。此後，奧利韋拉成為英國愛德華六世及葡國約翰三世的信使。在該情況及其後許多相同情況的事情下，雙方的知識及興趣得到互相交流，而澳門亦是他們感興趣的地方。這些資料也在笛福的小說中得到證實。

《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son Crusoe》小說是以主角命名，當中主角人物前往巴西。而在笛福的其他作品中，如《Captain Singleton》及《The History and Remarkable Life of……Col. Jacques》（中譯《杰克上校》）²⁰的主角人物則曾遊覽非洲、印度、馬德拉及澳門等地。魯賓遜以同樣的航程沿著馬六甲海岸航行，並能看到荷蘭船隊“在離開中國的途中”²¹。多個歐洲國家在東方發展商業體系，就是這個原動力推使我們的英雄前往中國，特別是指以商業貿易著稱的澳門。面對海上的敵人及海盜的危險，魯賓遜在前往南中國的旅程中表現得猶豫不決，並聲稱“我的同伴看到我沮喪的樣子……便鼓勵我，向我描述港口的模樣；那個海岸，並告訴我他希望可以踏足交趾支那，東京灣，還打算到澳門——一個曾經被葡萄牙人佔領的城市，仍然有很多歐洲人在那裡居住，尤其是希望經澳門到中國的傳教士”²²。其後，船長描述澳門為“很多英國或荷蘭船隻到過的地方，屬於中國的一部分”²³，因此，為免受海盜的攻擊，還是不要前往此地。

在魯賓遜的描述下，澳門從前是一個屬於葡國人的鄉村。但我們亦應考慮上述作品是一部由作者經過翻閱許多資料及幻想而撰寫的小說。澳門同樣亦是許多歐洲家庭的聚居地，尤其是葡國家庭。充滿著陌生事物的遙遠異地使航海家感到萬分欣喜。歐洲家庭就像重回歐洲“家鄉”懷抱一樣。在作家的腦海中總是強調外國事物經常伴隨著自然及人為的海上危險。在小說中，澳門作為歐洲傳教士到達全中國之交匯台階，突出了自身的形象，這一情況對澳門形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面對這些資料，我們不得不提及始建於一六零二年的莊嚴的聖母教堂。在該教堂裡，遺留著一些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記錄以作證明²⁴，而十七至十八世紀正是我們分析的這一著作撰寫時期。在上述作品²⁵中有提及葡國人的傳教工作，這樣使天主教的讀者對傳播宗教及拓展國家版圖的情況均有所認識，從巴西至東印度，魯賓遜在離開中國後，終於區分了“這裡”信奉天主教及“那裡”不信奉天主教²⁶。因此，我們可以

19. 例如我們提及佩雷拉的《中國條約》（一五六零年），而該條約亦由維斯翻譯為英文，一五七七年。該譯本收集在《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中譯《特佛耶在西方和東印度的歷史》）中，其後亦收集在普爾沙及阿盧的選集中。另外，還有一份卡斯塔涅達著《印度的發現及征服的歷史》的譯本，一五八二年，在五年後則發表了第二版。

20. 蒙福在笛福著《The History and Remarkable Life of the Truly Honourable Col. Jacques……》中撰寫簡介及註解，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一九六五年。

21. 笛福著《Farther……》，第三百六十七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22.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六十八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23.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七十五頁。

24. 參閱在《卡里亞諾民族》內之《大三巴牌坊：有關牌坊周圍之符號學》，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第五頁。

25. 笛福，《Farther……》第三百零七頁。

26. 同上，出處同上，第四百零一頁。

指出對於歐洲航海家而言，不同文化和諧共處的澳門是一個無拘無束的綠洲，並突顯了人類學風韻的外國事物。

從拉希文學至殖民後的文學發展，每個國家與“別國”均擁有其本身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許多時候它都與民族中心主義混淆。外國的modus vivendi是否屬西方形式，取決於觀察敘述者源自何種文化及地域。根據國籍、種族及美學的感覺，在亞洲人眼中，我們是一種樣貌及習慣均陌生的異國民族。外國事物的焦點與另一種種族的觀點有關，歐洲的情況，就正如以敘事者的觀點作衡量。作家的出發點、期望、興趣及塑造形象或把其他民族神話化等等的決定因素均是非常豐富多彩的，這一點正如歐洲人前往的目的地及吸引他們的事物一樣均是五花八門。在《The Farther Adventures》及《Captain Singleton》中，中國及日本的傳統文化的多姿多彩形象與歐洲的殖民地，如巴西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外國事物的出現造就了真實或虛幻的變化，而魯賓遜亦有提及在中國發生上述情況。在往東京灣及暹羅的時候，魯賓遜是經過歐洲人當時的（前）思想概念過濾後而觀察及描述當地居民情況，隨後發現在各方面英國比中國更勝一籌時，魯賓遜指出“他們的財富、貿易、政府的權力和軍隊的力量都令我們震驚，因為……這一切我們都沒有預期到”²⁷。同時為了避免遇見歐洲船隊，英國船隊前往台灣並由此啓航前往另一個中國沿岸的港口，在那裡有一個年老的葡國航海家提供嚮導的服務，他的經驗知識非常豐富：“靠近岸邊的時候，兩湮外一艘船駛向我們。船上有一位年老的葡萄牙領航員，他知道我們也是從歐洲來的，因此向我們提供協助，我們感到很高興……，我跟他談到帶我們到南京灣²⁸的事，那裡是中國最北的地方。他說南京灣很好，笑著問我們到該處的目的”²⁹。

在領航員與魯賓遜交談後，我們發現一艘船隻已在亞洲的港口停泊：“他告訴我們澳門可能是最好的港口，在那裡不可能找不到鴉片的市場，而且可以買到各式各樣價廉的中國產品”³⁰。葡國人企圖說服英國人在澳門這理想的港口通商，並在此賺取豐厚的利潤及帶回英國。為形容澳門港口的商業活動，他們用了形容詞good（好）的最高級best（最好）來修飾。當葡國領航員向船員查詢前往南京的目的時，他面露笑容並嘗試向魯賓遜說服澳門是中國沿岸銷售鴉片及購買任何中國產品的最理想地方。英國人則以否定的態度回應葡國領航員：“是的，葡萄牙先生，我說這並不是我們來這裡要做的……”³¹。

27.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八十六頁。

28. 在平托《漫遊之旅》的第二十六章中提及詞語Gulph of Nanquin。該作品於一五五三年由根特翻譯為英文。於一六六三年及一六九二年再版（參閱萊維《Portuguese Voyages》第七十八頁，一四九八年至一六六三年，倫敦，一九五三年）。笛福可能亦取得該葡文作品的譯本，而該作品就像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內容均是描述葡國人在中國海岸的遊歷。

29. 笛福，《Farther……》第三百七十三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30. 同上，出處同上（資料與題材有關）。

31. 同上，出處同上（資料與題材有關）。笛福將葡語（“Seignior”）一詞與西班牙語混淆。從《魯賓遜漂流記》第一冊開始，由於近似性及某些外來語的因素，他都以該詞來表達。魯賓遜在巴西曾學習葡語，而葡語在東方海岸亦廣為使用。參閱蘇利範著《The Age of Discovery 1400-1550》（中譯《大發現時期1400-1550》）朗文，倫敦，一九八四年，第二十三頁，“一五五零年建立了利潤豐厚的外國生意，每年載運一船貨品一著名的黑船一由果亞運送歐洲貨品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基地，再裝載中國絲綢，運到福崗售賣，交換所得一般為白銀。葡萄牙人是最早的世界貿易商人……”。

在談及海盜和海上“不遵守法律的人士”後，葡國領航員表示知悉亞洲及歐洲的現時情況，因此，英國航海家把他當作為“經驗的智者”。葡國領航員還通知魯賓遜可直接與中國居民通商，避免了歐洲敵人攻擊他們船隊的危險：“Quinchang³²，傳教士一般從澳門來到這裡登岸，向中國人宣傳基督教，從未有歐洲船隻在此登陸……有時候他們在那裡做生意，因為有日本人希望購買中國貨品”³³。還有，笛福提及中國的傳教工作是由澳門開始。葡國領航員表示只有他才熟悉中國海岸及如何進行通商，而且亦通曉日本的情況，這樣，他便使魯賓遜的朋友放下思想包袱“如釋重負”³⁴，換言之，就是其背上的重擔，因此，他成為英國船員的朋友。該領航員使我們想起魯賓遜小說的葡國船長，因為該船長在非洲海岸救了魯賓遜一命，並帶了魯賓遜回到巴西。同時當英國航海家需要船長幫助的時候，他表現誠懇並樂於助人。在中國，這個葡國人物同樣表現出樂於與英國人結伴而行，前往世界各地遊歷，英國人稱他為“永垂不朽的老船長——一位葡萄牙人”³⁵。

勇敢的“葡萄牙領航員”為英國船員與日本航海家製造多次接觸的機會，隨後，他們一起前往北京，那裡亦有他的朋友。在中國首都：“由於我們希望晉見皇帝，因此我們把葡萄牙領航員帶上，付款給他與我們同行，並為我們作傳譯。他能聽懂該國語言，又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和一點點英語。事實上，無論到哪裡，這個老人家都是我們最有用的工具，因為我們到北京不到一星期，當時他笑說“哎，英國貴族……”³⁶。英國人認為年老、充滿好奇心及精力充沛的葡國人是他們航程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因為他熟悉中國各地的情況，並精通拉丁語及葡語。魯賓遜由於長期逗留巴西，因此亦諳上述語言。領航員亦精通法語、英語及“國家語言”。在北京講普通話，而在澳門地區則講廣東話。笛福是否不清楚這一情況或者這個葡國人是否真正通曉多種語言呢？魯賓遜在許多葡國人居住的巴西生活，使他獲益良多，而他的生活經驗亦是非常難能可貴。他喜歡遊歷因而到處旅遊冒險，並決定酬謝從澳門一直陪伴著他的領航員“這個人，坦白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他最需要的人……”³⁷。葡國人總是樂於助人，包括向英國船員傳達一些有關中國民族手工藝的資訊“葡萄牙領航員愛說笑話……他說給我看我國的珍品。……一所用“中國製品”建造的房子，正如在英國所用的名稱，在我們的國家（葡萄牙）叫這種所謂“中國製品”為瓷器”³⁸。葡國人親自向英國人介紹一所世上罕有的擺放著琳琅滿目的瓷器的房屋。領航員並解釋這詞在英語及葡語的區別，就像理解不同的文化及modus vivendi“……英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他說，“但中國人對你所說則有別的理解”³⁹。

32. 葡國航海家、中國人及日本人對該港口一詞的發音均有不同的方式。因此，笛福對該詞的三種發音都表示理解，並指出這是由於不同文化對同一地點都有著本身的發音方式。參閱笛福《Farther……》，第三百七十七頁。

33.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七十七頁，並參閱第三百八十一頁中作者提及葡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同時由於英國國教為基督教，因此，受到《Romish priests》批評。

34. 笛福，《Farther……》，第三百八十頁。

35.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九十七頁（資料與題材有關）。

36.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九十頁。

37.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九十一頁。

38.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九十三頁。

39. 同上，出處同上，第三百九十五頁。

由北京出發，前往英國的途中，當英國船隊被敵人攻擊時，“葡萄牙人”又一次顯示他的冷靜及靈敏的思考能力，因此魯賓遜指出：“年老的領航員是我們的船長，也是我們的工程師……”⁴⁰。魯賓遜在澳門所遇到的葡國人的角色是航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並得到高度的重視及讚賞，由於他不單止是航行的專家，也是在貿易往來和航程中出現實質問題的解決能手。

魯賓遜及鐵鈎船長的冒險歷程中，不能缺少樂於助人及經驗豐富的葡國人的參與，並在世界各個角落給予他們援助。魯賓遜表示非常喜歡葡國人及在澳門所遇見的領航員。雖然在海上葡國人是英國人的敵人，因此，在初期他對葡國人的印象是負面的。在巴西的旅程後，海盜鐵鈎（博）經過霍爾木茲及菲律賓返回香料之路的東方，而在該地進行通商已經不是奇聞，“由於葡萄牙經常有船隻從中國的澳門回來，帶同中國商人賣給他們的香料。中國商人同樣地經常用中國貨品換取荷蘭香料”⁴¹。小說作者敘述當時他們的競爭者葡國人在澳門地區已有直接及間接的貿易伙伴，因此，一如巴西及非洲的情況，不利於鐵鈎的船隊進行貿易。

英國船長指出在果亞學懂了“一切醜惡事，從葡萄牙人當中看到最不誠實、最墮落、最自大、最殘酷的一面——一個自稱信奉基督的國家”⁴²。鐵鈎把在旅程中所遇到的民族與葡國人相比，顯然減少了對葡國人的批評，因為在葡國人腦海中只有盡量賺取更多的金錢。因此，我們從作品中可覺察到葡國人的形象及他們常到的地方的變化，就如印度的情況。為何有如此的變化呢？鐵鈎是英國海盜及隨後是葡國人的敵人，葡國人對他的攻擊曾否作出自衛呢？羅馬教皇的宗教應否反對亨利八世呢？笛福希望強調在東方海岸是沒有法律可言，這正如發生在魯賓遜身上的情況。作者可能只想向我們提出葡國人的另一個觀點，因為每一個社群都有他們的觀點。

身為記者的笛福可能曾翻閱有關印度賄賂情況的評論及資料，在今天賄賂被視為導致東方王國沒落的原因之一，因此，貿易往來隨後轉向大西洋發展。魯賓遜及鐵鈎亦曾到達大西洋。前者欲以工作致富而後者則欲以搶掠致富。上述兩個人物的不同興趣可能逐漸得到過濾並影響他們所建立的形象，而在葡國及澳門均有反映該形象。

外國事物的題材亦與經濟問題有關。然而，我們感興趣的只是，透過人類學及文學中的各種現象所反映的澳門人、中國人及葡國人的觀點。不過當描述中國的地貌、民族及風俗習慣時，由於讀者或評論家不諳所有藝術的表達方式，以致對“外國事物”的認知存有顯著的偏差。無可避免的是，不論相近／類似，抑或差距／差異，這種論證歐亞之間差異的方法，始終都是以類推和比較來評定價值論的。同時，透過對其他人的無知和野蠻行徑，也嘲諷了自詡文明的“我”。這種外國主義－東方主義也成了一種教化的武器，從而產生“我”的社會及政治縮影的反面教材。由此，我們可談談涉及哲學的外國事物。而我們還可提及“人類學、社會學、

40 同上，出處同上，第四百二十四頁。

41 同上，《Captain Singleton》，第三百零八頁。

42 同上，出處同上，第七頁。

文化、肖像、修辭學、語言學及文學美學等的外國事物”⁴³。例如，談及在澳門一些有關外國事物的繪畫中，英國畫家錢納利的作品（倫敦，一七七四——澳門，一八五二），作品中展現了典型的澳門人物及與她有關的所有異國風情的生活體驗及周圍事物。

外國事物的差異亦是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在人類學的研究論文中以盡可能如實重現或描述外國事物為目的。在外國事物中，除了追求人類學的趣味外，我們還可提及遊客及“exota”的趣味，這就如西格倫自身受到啟發而追尋“plaisir de sentir le Divers”⁴⁴。同樣，我們亦可從錢納利的作品中發現，其作品是以日積月累的多元文化知識為基礎，再借助色彩斑斕的意象，使其作品充滿異國情懷。

憑經驗來看中國文化，會發覺它別有天地，這個發現是多方位的，是一種情感欣賞成果的擷取。然而，以客觀身分是難以洞悉其中奧秘。托多羅把“exotopie”的發現過程稱作為“affirmation de l'exteriorité de l'autre qui va de pair avec sa reconnaissance en tant que sujet”⁴⁵。另一種與“本國”文化相距甚遠的“外國”文化的出現，就是本次研究的對象——東方學。它是一項要求理解其所有複雜性的跨學科研究。外國事物的概念融合了從地域及虛幻的旅程中賦予人類的經驗，並反映了每一種文化在互相影響下的不同形象。在葡國文學中亦反映了有關中國的形象，反過來亦然⁴⁶。

魯賓遜及鐵鈎船長的澳門之旅，不論是真是假，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同時，該旅程創造了變化萬千的時空及人物的神話，作者偶爾使用誇張手法處理，偶爾以感性認識等多種手法來描述。外國事物可能只是西方文化的對立反映（在《The farther Adventures》中的中國）或是另一種文化的反映（在《The farther A dventures》中的澳門）。該反映是基於對不同種類的文化及modus vivendi進行觀察，並嘗試將之解碼。除了無數記敘著作及活靈活現的象徵手法的著作外，從十五世紀的大發現、遊記以至現今的旅遊指南及各種民族的特色膳食均反映了外國風情。

外來事物與前往另一個地方的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有時純粹是藝術創作及幻想虛構的成果（《Farther Adventures》及《Captain Singleton》）。有時，它則是帝國主義思想推動下，實現擁有外國事物的夢想的成果。翻譯當地語言是與外國文化交流的前提之一。在《The Farther Adventures》⁴⁷裏葡國領航員曾提出這個問題。

另一種文化的美學特徵及標誌亦在小說主角人物到達中國海岸時出現，我們透過列舉地名、稱號、短語、模仿異地語言的聲音⁴⁸及其他性質的標記，便可讓讀者

43. 在布埃索著《遊記文學、故事、歷史及神話》中的第五百六十六頁內之《在葡國文學中的異國情調或“各種美學”》一文，科斯梅出版社，里斯本，一九九七年。

44. 塞加倫，第三十頁。

45. 托多羅著《La Conquete de l'Amerique》，Editions du Sevil，巴黎，一九八二年，第二百五十四頁。

46. 參閱《文化雜誌》第二十三期（第二組）內霍啟昌撰寫《葡國人在清朝的最早形象》一文，澳門，一九九五年，第五頁至十二頁。同時亦參閱同一雜誌內洛雷羅撰寫《在葡國大發現文化中之中國形象》一文，第十三頁至十八頁。

47. 笛福，《Farther……》第三百九十五頁。

48. 參閱布埃索著《十六世紀外國語言之研究》，ICALP，里斯本，一九八三年。

得知不同於他們的詞彙世界。例如衣服、外貌輪廓、手勢、事物的特徵及喜好。正如我們在整篇文章的分析中，外國事物是以明確或含蓄的比喻、模仿技巧或脫離現實的手法來表現，就正如荷里活西部電影的北美印第安人。總括來說，有關外國風情的文章都是以虛構情節來堆砌的，以便達到其既定的目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又會如實反映當地的情況。創造這些象徵性的題材及人物有助於讀者理解異地文化，有時該題材更與讀者的“期望”不謀而合。(cf.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中譯《讀書：美學反應理論》)。透過前往世界各地的使命，人們在曾踏足的土地上展現外來的物質、人力資源以及語言。在澳門及中國其他地方，相繼發現了中國以外的異國風情的事物。葡國的領航員就是以這個宗旨為己任。

以形象生動的象徵手法來進行描寫的著作可改變讀者的思維方式及拓寬其知識的範圍。英國的 *homo viator* 在描述新的現實情況中，特別注重一些不利於外國文化⁴⁹ 的細微情況，因此，他認為有需要改變讀者的思維方式及對外國事物的想法。笛福的有關外國事物的文章是一個概念的工具，並能在面對舊大陸的信條時，幫助讀者理解在新世界中產生的疑問、恐懼及威脅。許多與外國事物有著密切關係的題材都是有系統地迅速得到發展的，特別是從伊比利亞的對外擴張到大發現的新時代，甚至今時今日，這個題材都能在歐洲文學中得以發揮。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隨著多次的新發現，知識不斷地傳播及吸收，提高了人們理解及思考各種現實情況的能力。由於外國事物的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及文化得以逐漸改變。透過上述我們所分析的作品得知，*Jamais vu* 將會逐漸蛻變為 *deja vu*。

因此，我們的結論為，透過笛福的作品所表現的中心思想，反映了葡國人及澳門的形象都是積極進取的。澳門也將繼續成為融匯外國多元文化知識的台階。

49. 魯賓遜敘述一些有關澳門生活的情況，也就是，澳門的（舊）政府、港口、商業往來及該地居民的家庭等情況。而鐵鈎船長則只提及盛載香料之葡國船隊往來澳門的活動。

